

高考的“统”“分”之争与“片面应试”

文周序

〔摘要〕试图通过降高考由“统一命题”改为“分省命题”来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是一种较为流行的主张。但从追求公平的角度来看,片面应试的根源并不在于高考的统一命题而是在于对公平的极端化追求;从现实的角度看,统一或分省命题和学校追求升学率的动机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分省命题”难以实现促进素质教育的初衷。

〔关键词〕高考 统一命题 分省命题 片面应试

DOI:10.16194/j.cnki.31-1059/g4.2015.08.006

一、高考命题的“统”与“分”

1985年,上海市率先拉开高考分省命题的帷幕;此后,分省命题范围逐渐扩大到十余个省份;2006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分省命题工作暂行管理办法》,为分省命题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导和依据。

实行了这么多年的全国统一命题,为什么要改成分省命题?一种很流行的观点是,在全国各地教育质量和环境差异巨大的情况下,“统一命题”用一套单一的标准和内容对学生进行衡量和选拔,导致教育过程有制造流水线产品的嫌疑,因而需要实行一种多元化的命题方式来改变这一局面。但“多元”本身并不是目的,“多元”背后呈现出来的价值,例如让不同学生的个性、特长和才能都有机会得以展现,才是真正的追求所在,这和“素质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于是,“分省命题”的思路与批判“片面应试”、倡导“素质教育”的精神结合了起来。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分省命题工作暂行管理办法》中,第三条是这样写的:“分省命题工作按照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和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原则实

施”。这一原则告诉我们,赋予高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目的在于为高校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而要培养真正的“人才”,则依赖于“素质教育”的推行。因而,保障“素质教育”的有效实施可以看作是“分省命题”工作的落脚点所在。

但是,多年过去了,高考改革并没有因为实行了分省命题而万事大吉,依然是任重而道远。要说分省命题想做什么,当然是想打破一张试卷一统天下的局面,但要说分省命题做成了什么,好像也只是打破了一张试卷一统天下的局面。虽然有人认为分省命题可以“让地方有权制定符合各自情况的教学与考试大纲”,“有利于体现地方特点,便于高校有针对性地选拔人才”^[1],但问题是,分省命题实施至今,“素质教育”的成效并没有得到多少体现,网络曝光的诸如高三学生集体打吊瓶上自习、校园中悬挂着“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的标语;以及母亲遭遇车祸,女孩含泪进入高考考场等新闻事件在全国各地频繁出现,倒是将“应试教育”的气氛烘托得愈发热烈。

此外,分省命题导致的诸如保密风险加大、命题质量下降、命题成本增加、阻碍人才流动、地方保护

主义色彩浓厚等问题,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而在“分省命题”的热潮尚未退却之际,“恢复统一命题”的呼声也开始高涨。但呼声毕竟只是呼声,真要退回“统一命题”的状态,却也阻力重重。有些事情,一旦实行了就很难回头,比如当初的高校扩招,数年之后大学生就业难、文凭过剩等现象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却很难将招生人数下降到扩招以前。分省命题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批判统一命题导致了“应试教育”者有之,为分省命题进行辩护者有之,斥回归统一命题的观点为“开历史倒车”者亦有之。

二、“统一命题”是“片面应试”的罪魁祸首？

1977年,高考制度在中断多年后得以恢复,但当年的高考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实行的是分省命题;到了1978年,便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但几乎就在同一年,关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批评和“改革高考制度”的讨论开始连篇累牍地见诸报端,在此后的许多年里,高考在选拔出大量高分学生的同时,也导致了“高分低能”“千人一面”“片面应试”等弊病,“统考”面临的批评和指责也越来越多,其中最激烈的恐怕要数来自顾海兵教授的批判:“统一高考制度一日不改,中国的创新基础一日不可能厚实,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一日不可能强大!”^[2]

高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高考需要进行改革,这也应该不会招致非议,但是不是要改回1977年分省命题的老路上去,却值得认真推敲。毕竟,1977年的高考是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高考,据马国川、赵学勤编著的《高考年轮》一书记载,当年很多青年学生都是走街串户地借来老课本和学习笔记自学备考^[3],学生们自行备考的时候会不会片面、单一地追求分数都很难说,更何况是在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当中。

“片面应试”的根源在哪里,这有必要进行讨论。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情面、地位、金钱都有很大的能动空间,这也导致民众对社会具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汉朝,人们对主观选拔色彩浓厚的“察举制”就有这样的评价:“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4],可见以主观判断为主的“察举制”在当时并不是很得人心,而费正清在评价

科举制度的时候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5]。历史发展到今天,当高考录取遭遇社会诚信的缺失的时候,维护高考的公平性自然也就成为一个最基本最底线的要求。但由于中国各地社会、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因此到底何为“高考公平”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不考虑客观因素,一律凭分录取,还是适当照顾到地区、民族差异,实行差别录取?抑或是考虑到大学的人才需求,对部分学生实行保送、加分等照顾措施?2009年,《中国青年报》分别对“将综合评价纳入高校招生”^[6]“保送生制度”^[7]“校长实名推荐制”^[8]等问题进行了民意调查,从社会公众的意见来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民众最为接受的、相对“公平”的一种考试录取方案。在民众心目中,一切凭分录取虽然无法避免教育质量差异带来的不公,但这种不公还有望通过个人努力来消除,而金钱、权力、关系、人情等因素带来的差别是个人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弥补的,只能依靠“一切由分数说了算”这一刚性指标来淡化其影响。因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最容易让民众接受的、一种相对公平的考试录取方式。这样,为了维护这种可接受的“相对公平”,分数便成为对人才进行评价和选拔的唯一标准。

当分数成为唯一标准,那么最大化地提高分数便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凡是能够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的方法,都会被反复加以利用。因而,高中教育当中出现了千校一面的情况:研究试卷、探索命题规律、总结解题技巧、满堂灌、题海战术、频繁考试……这就是“片面应试”教育的典型体现,也被视作是最有“效率”的教育方式。而如果某些学校、某个地区要强行推行“素质教育”,反而会陷入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2004年南京“高考之痛”就很能说明问题,当年南京的一名考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出了这样一番话:“高中三年学习中,学校教学只有80%的时间和高考有关,……学校用上课时间给我们组织社会调研、第二课堂等素质教育的内容,占全部学习时间的两成多,但这些对高考没有用,我真后悔当初浪费了太多时间。”^[9]

在社会大环境不被信赖的情况下,对于具有高利害性质的高考而言,无论它采取的是统一命题还

是分省命题,其最看重的东西都是“公平”而非“有效”,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自然也就成为“公平”的象征。当分数成为教育合理且合法的追求的时候,一切教育措施都自然会围绕分数来选择,越有“效率”的措施越受欢迎,这样,“片面应试”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分省命题”只是将命题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并没有改变追求“公平”的思路,也没有改变“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筛选原则,自然也就无法避免“片面应试”的现象。所以,在“分省命题”推行多年之后,高考依然以千千万万考生的“压迫者”的形象出现。

三、分省命题有助于实现素质教育吗?

无论是全国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命题,在录取的环节中采取的都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这就意味着不管是由谁命题,对同一个省区内的学生而言,在竞争的激烈程度上其实并没有差别。这就给“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这一目的的实现出了一个难题。

作为学校来讲,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是关系到学校能否获得高额的教育拨款,能否招揽优秀生源,能否提升自身地位的核心指标,无论是在“统一命题”的年代,还是“分省命题”的今天,“升学率”都是学校孜孜不倦的追求。因此,如何最有效地提高“升学率”,就是学校最关心的事情。近年来,随着市场介入教育领域,升学率和学校利益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市场以“利润”作为调节行为的杠杆,而带来利润的最有效方式即满足顾客的需求。在教育中,作为“顾客”的学生,其最大的需求便是升学,较高的高考分数则是其升学的保障。而学校的利润——优质生源和经费拨款——几乎就是绑定在一起的,如果一所学校无法满足学生的这一需求,那么就没有了市场声誉,在失去优质生源的同时,也会失去大量的财政拨款。因此,学校表面上是一个教学机构,实际上却一直从事着用学生的分数交换自身利益的市场行为。

不仅学校之间会互相比较升学率,“升学率”的高低也被视作地区教育发展质量的指标,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源和更多的经费,地区与地区之间也会互相比较升学率。因此,学校教育工作的逻辑同样适用于一个地区的教育事业,学校内部的全部工作围绕

应试运转,对一个地区而言也是如此,从而,应试不再仅仅是学生为追逐个人利益而出现的现象,而且是每所学校、每个地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指标、有体系的行为。由此,升学的压力又被复制到了地区层面。所以说,“升学主义”是应试压力自下而上一级一级不断复制的结果。但是,当学校和地区承受的升学压力过大的时候,又会自上而下地对教师和学生施以更大的压力,从而使对“升学率”的追求在实践中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

这个怪圈与高考试卷到底是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命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在统一命题的时候,学校要追求“升学率”,在分省命题之后,“升学率”依然是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几乎唯一依据。高考命题的“统”与“分”,并不能改变学校追求升学率的动机。由于高考改革的着眼点在于维护公平,因而无论是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命题,都无法解决片面追求效率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法杜绝“片面应试”的现象。因而,期望通过分省命题来促进“素质教育”的落实,就给人一种“药不对症”的感觉。

四、统一还是分省:也许是个假问题?

当追求分数和“升学率”的功利性目标难以撼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如何让学校教育通过一种恰当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方式来实现其追求升学率的功利目的?

我们发现,如果个别省份的高考试题出得较好,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但这与其说是“分省命题”的结果,毋宁说是命题质量高的结果。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现有的高考题目还达不到全面而真实地对学生进行评估衡量的效果。因而,在现有高考命题技术面前,一些简单、片面甚至机械的教育方式,例如满堂灌、题海战术、频繁考试等等,往往能够更加快速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分数。虽然我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能力题”“应用题”,但目前这些题目的质量并不能够很好地达到考察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而是往往被各种答题技巧、套路破解。这样说似乎有些对高考命题人的不恭之处,也容易招致高考命题机构的指责。但当看到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主张“要把没公式的语文教成有公式”^[10],越来越多的政治老

师让学生揣摩“答题套路”,越来越多的化学老师提出要让学生形成“程序化思维”^[11]的时候,我更加坚信我曾经提出的一个观点:“就参加高考而言,在‘夯实’基础之后,往往没有必要让学生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吃透、深挖这些知识点或加以实践运用,而是转向解题技巧的训练,这样反而能有效地在高考中取得高分”^[12]。

因此,如果说“片面应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诚信的普遍缺乏迫使高考极致地追求一种机械的公平,那么命题技术的不足则为满堂灌、题海战术等僵化的教育方式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当社会大环境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时候,努力改进命题技术,对于缓解“片面应试”的问题,应当有一定的价值。

对命题技术的改革,关键不在于由谁命题,而在于命出什么样的题。恢复高考以来,我们曾经在命题技术的革新方面作出了努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高考传统的命题方式和考试方式的固有缺陷,研究考试的学者们经过调查和论证,提出应以现代教育测量理论为指导,吸收标准化考试的理论和经验进行高考改革。1985年开始在广东省试行,1989年在全国推行的标准化考试改革,被认为“加强了高考命题的科学性和可控性,减少了考试误差”^[13]。并且由于高考标准化的改革还包括对各种题型功能和试卷题型比例等多方面问题的实证性研究,规范和稳定了试卷的形式,还把光学符号阅读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引入高考评分,因而“使客观题的阅卷快速准确,主观题的评分误差也得到了有效控制”^[14]。这些进步都是在统一命题的情况下取得的,可见,“统一命题”未必就僵化死板,“分省命题”也不见得就一定生动活泼。但随着分省命题的推行,各地的专家资源被分散,导致部分省份缺乏高质量、稳定的命题队伍,从而造成命题质量的下降,有报道反映,从每年的《全国高考试卷评价报告》来看,有些分省命题的试卷根本没有按照教育部统一制订的《考试大纲》命题,出现“超纲”现象,而且每年的试题都会出现疏漏甚至错误^[15],命题质量的下降当然也就给各种应试技巧、答题套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片面应试”推波助澜。与此同时,近年来,

命题技术层面的研究日渐式微,以至于高考命题方式当中存在的一些固有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各种作文模板、答题套路等种种操作性的学习内容,以及不评不议、固化思维等用规训手段代替教育手段的现象层出不穷,有的还很普遍。

这样看来,“统一命题”并非“片面应试”的罪魁祸首,而“分省命题”未必就能够让我们在“素质教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统一的思路不见得落后,分省命题的做法也并不是那么先进。由于“片面应试”的根源并不在“由谁命题”这个问题上,因而如果仅仅是从促进“素质教育”的目的出发来讨论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命题哪个更好,就似乎已经没有了必要。

参考文献:

- [1]张敏,亢德喜.高考到底要不要走向分省自主命题[J].基础教育,2005(7,8):41.
 - [2]顾海兵.高考与统一高考之辩——兼与孙东东教授商榷[J].湖北招生考试,2002(2下):16.
 - [3]马国川,赵学勤.高考年轮:高考恢复30年[J].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 [4]《抱朴子》外十五篇《审举》.
 - [5][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孙瑞芹,陈泽宪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41.
 - [6]王聪聪,黄荷.欣喜过后是担心,民调显示新课改高考让人喜忧交集[N].中国青年报,2009-05-13.
 - [7]王聪聪,吴拓宇.为什么82.2%的人认为保送生多是“关系生”[N].中国青年报,2009-07-14.
 - [8]谢洋.校长实名推荐七成网友反对[N].中国青年报,2009-11-12.
 - [9]吴非.“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J].教育发展研究,2004(10):76.
 - [10]周颖.“县中”模式的特点及成因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2009:70.
 - [11]马长水,李冬水.把握高考脉搏——科学备考有机化学基础[J].考试与招生,2009(12):41.
 - [12]周序,郑新蓉.高考承载的“异化”压力与可能消解[J].中国教育学刊,2012(2):18.
 - [13][14]臧铁军.1977~2007,高考改革焦点回眸[N].中国教育报,2007-06-06.
 - [15]古晔.高考命题:分省还是统一?[N].光明日报,2011-11-28.
- [周序.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361005]